

司马迁人生悲剧涉及的三个问题

董志广

内容提要 身陷刑辱、忍辱求生与抗志自拔乃司马迁人生悲剧的三大构成要素。李陵叛降的真正原因，先秦汉代的主流士风以及《史记》对某类人物的特殊处理，则是以上要素所直接关涉的三个问题：一、司马迁之“身任李陵”确有认识上的严重失误；二、传统与当下的士风主流增加了司马迁刑后余生的身心重负；三、《史记》中的部分人物评价有此重负清晰投影。

关键词 司马迁 李陵 主流士风 生死观

李陵降北直接导致了司马迁取祸陷刑；陷刑后的司马迁依然能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依然能全力坚守个人的价值信念并最终使之彻底实现，充分显示出其人生经历确实具有高度的悲剧性。不过从另一角度看，司马迁之护持李陵乃认识上的重大失误，其基于价值信念上的自强不息与忍辱负重，也并不完全契合先秦汉代的士风主流。因为大量的事例表明：先秦汉代士人一般不会因个人的价值追求而接受困辱，相反，当困辱来袭时，他们所做的选择往往是宁可舍弃生存也要维护自尊。两者间的这种不合，便给同样自尊且敏于自省的司马迁造成了特殊压力。为缓解或摆脱此特殊压力，司马迁也曾殚精竭虑，费尽思量；由此一种全新的生死观便得以形成。在一定范围内，这种生死观也影响了《史记》中的人物描述与人物评价。

—

李陵降叛本罪昭著而不可掩，但自司马迁《报任安书》出，此人的行迹即被蒙上了一层迷离色彩。这层迷离色彩由于也印有司马迁遭受祸难的凄苦身影，并往往会使人联想到《史记》的不朽成就，一定程度上便淡化了李陵之降的危害性，这主要表现在：从汉代至元明，李陵叛汉之事并没有引起士人们的足够关注，或者说人们对此事大都采取了一种宽容态度。在这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有关李陵其人的批判与责难仅见于王充、白居易及张耒等几位论者；而且即使是这几位论者的批判、责难，也是他们在质疑司马迁时附带做出的，因此既不够尖锐，亦缺乏深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清易代后才有了明显转变。

伴随着诸多叛臣的纷纷现身，明清易代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程后即已成事实。但当时的一些有志之士却对此不予接受。他们愈不接受这一事实，便愈会对那些叛降者充满愤疾，愈会认定明朝的覆亡与此类人的卑劣行径有直接关系。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的愤疾与认识并不能以直接的方式来表达，而只能借历史上的特定人物以出之。在特定的历史人物中，最可为其所用者无疑当首推李陵，如此一来便导致了李陵降北及司马迁陷刑的问题被重新提出。由于问题的重新提出伴有时人的身世之悲与家国之痛，所以他们表达的观点不仅更趋激烈，而且一针见血：

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其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

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逆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①

此为王夫之就李陵之降及司马迁的辩词所作的评议。王夫之的这一评议可谓是笔锋犀利、剖析入里，其结论不仅能引发出人们新的研究兴趣，而且也将为新的研究确定方向。当然，评议谓“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的确有些过激和轻率，然而换一个角度考虑，这种过激或轻率之于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却不无启示。同类性质的评议亦见于顾炎武的《日知录》。在《日知录》中，顾炎武于略举先秦时期的降者之例后又进一步指出：

下及汉、魏，而马日磔、于禁之流，至于呕血而终，不敢覩于人世，时之风尚从可知矣。后世不知此义，而文章之士多护李陵，智计之家或称谯叟。此说一行，则国无守臣，人无植节，反颜事仇，行若狗彘而不知愧也。^②

与王夫之相比，顾炎武的行文显然要从容一些，他以“文章之士”替代司马迁之名，也表现出了一种适度的克制和同情；但就最终的结论而言，其立意则更加深刻，视野亦更为高远。在顾炎武看来，叛将降臣理应遭人唾弃、受人鄙视，而一味地为其辩白则有悖常理、不合道义，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导致士风的衰变，进而从根本上危及到社稷的稳固和安全。

自李陵叛汉至顾炎武、王夫之作出上述评议，相去已一千七百余年。他们二人之所以仍心存愤慨地重论旧事，一则是为了要表达各自的政治情怀，另外也是由于李陵之罪在士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还远未得到彻底清算。李陵之罪能经历如此漫长的时期不被清算，除有其历史和社会政治的原因外，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亦密切相关。

对于李陵的陷败而降，司马迁执有的观点从一开始就完全背离了当朝君臣们的集体意志，而且在因此受刑后，其所执观点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为了阐明其观点的正确进而令世人相信李陵之降乃事出无奈并情有可原，司马迁于《报任安书》中曾给出了多重说辞：其一，与匈奴之战，汉军士卒所以能临绝境而愈勇，“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应归因于李陵的表率作用和人格魅力；其二，李陵素有国士之风，“事亲孝，与士信……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三，李陵战败而降绝非贪生怕死，他降北的真正目的乃是要“欲得其当而报汉”。从实际发生的情况来看，司马迁的这些说辞显然都难以成立。首先，李陵为求活命而甘作降将充分反映了其本性的怯懦，故汉军士兵奋力迎敌、誓死而战的大无畏勇气不可能因他而起。其次，如谓李陵“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则与匈奴一役正是其实现夙愿的适当时机，但他做出的最后选择却证明了司马迁所云并不属实。再次，认为李陵之降另有目的只是司马迁的一种主观猜想，即使完全忽略李陵降后的斑斑劣迹，这样的猜想也显得太过随意，不合常理。

司马迁的上述说辞虽难以成立，但由于其中已融入了浓重的悲情成分并排序的顺畅自然、层层相通，它们还是起到了“为陵文过”的巨大作用；可以认为，自它们流传开来后，一个本应遭人唾弃的叛臣形象便被颠倒了。由司马迁最先造成的这种形象颠倒，也直接影响了后代士大夫们对李陵其人的心理定位，如班固为李陵作《传》，即过分渲染了其战败过程的悲壮色彩。这种渲染几乎都承袭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又如班固将李陵的反颜事仇归罪于李绪并尽录其责问汉使之辞，也与司马迁的报汉之说有直接关系。当然。就原则立场而言，班固毕竟不同于司马迁；在《汉书》中，班固能将苏

① 《读通鉴论》卷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1—72页。

② 《日知录》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16—817页。

武、李陵合为一《传》，能使李陵在面对苏武时感到无地自容并发生“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①的真心悔叹，说明他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认知底线。班固之后，随着时代精神走向衰落，士人群体的政治操守亦深受消磨，于是从魏晋时期开始，士人们对李陵事件便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闲适兴趣。受这种兴趣的驱使，他们当中先是有人假托李陵之名炮制出了《答苏武书》、《与苏武诗》等伪作^②；后来《与苏武诗》又被人进行过模拟（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李都尉从军》）；再后来李陵的滞留匈奴竟见诸咏赞了^③。而且无论是伪作、拟作抑或咏赞，它们当中均萦绕着低沉的伤感情调，透过这种情调可以看出，至魏晋南朝时期，关乎军国大计的李陵事件已被士大夫们用来叙写个人的闲愁和忧思了。还不仅如此，观托名李陵的《答苏武书》另可得知，此文作者更怀有为李陵叛降饰污掩罪之用意；此文援古论今，多方比附，推言陵功，曲彰汉过，目的无非是要将气节尽丧的李陵扮裹成一忍辱含冤的受害者。这层用意充分反映了魏晋南朝士人们“自取身荣，不存国计”^④的卑微心理，同时也完全契合于他们普遍持有的那种“陵阙虽殊，顾眄如一”^⑤的处世态度。

由时代变迁与士风日衰而引发的上述现象恐怕连李陵本人都不曾想到，据《史记》、《汉书》所载，李陵于决意降北前既已坦言：“无面目报陛下。”^⑥此言表明，仅只因汉军战败且伤亡惨重就使得他内心有了负罪之感。既然已有了负罪之感，则身为名将的李陵就更无理由悖逆叛汉。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本应像副将韩延年和其他士兵那样奋力迎敌，直至战死，这方能彰显出个人的气节与尊严；也可以像楚臣子反、晋臣荀林父那样率部搏杀，直至还朝，然后再领罪请死或自行了断^⑦，这同样合于传统的为将之道。但由于不具备起码的“死节”勇气，李陵最终只能选择屈膝而降、冒辱求生。在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后，其原有的负罪之感亦随之加重，所谓“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⑧，正可以看作是他真实心态的自然外露。“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者不为也”^⑨，而叛将降民乃冒大辱之尤甚者，因此在历史上，这类人从来就是为士君子所不齿的。有关历史上的早期事例，孔子过陈门而不轼即令人印象深刻。孔子不轼陈之降民，说明他从心底里就鄙夷他们。孔子认为，凡甘为降民者均属头脑愚钝和性情懦弱之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何谓智、勇、忠、信，也不会因自己邦国的安危而有所作为，故理应受到世人的轻视和唾弃。如果说降民的愚钝与懦弱已有损智、勇、忠、信之道，那么降将叛臣所造成的危害还要更深。所以关于他们的该当之罪，早在汉代前的律令中既有了明文规定，如《战国策·魏四》及《尉繚子·重刑令》皆有记载。

据汉代前既已定出的这类律令，为将而降乃不赦之罪。以这类律令来绳量李陵，则其罪戾之重，又有过者，因为李陵为将，不仅贪生降敌，而且反颜事仇；为求活命，弃慈母于保宫，置妻子于不顾，入赘单于，椎髻胡服。又观其劝降苏武之辞，乃欲陷节士于不义；愧而借曹刿掩耻，更显其品格可鄙。凡此种种，足以证明李陵实属一心性卑劣之人，故当其阖家被族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⑩。

① 《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册，第2465页。

② 分见颜延之《庭诰》、《文心雕龙·明诗》、《史通·杂说下》、苏轼《答刘沔都曹书》等。

③ 分见庾信《李陵苏武别赞》及《哀江南赋》。

④ 《陈书》卷六《后主本纪·史臣论》，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册，第120页。

⑤ 《南齐书》卷二三《褚渊·王俭传·史臣记》，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册，第438页。

⑥⑩ 《史记》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册，第2878页。

⑦ 分见《左传·宣公十二年》、《左传·成公十六年》。

⑧ 《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第8册，第2464页。

⑨ 《春秋繁露》卷二《竹林》，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1页。

二

对于司马迁因李陵而受祸的经过,《汉书·李广苏建传》有比较清晰的记述,其中有两点需特别引起注意:首先,当汉军败讯传至京师,武帝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弄清李陵是否已经战死。由此可知,对于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来说,为将者能够在关键时刻尽忠死节远比某一战事的成败得失来的重要。其次,当李陵降北的消息被确认后,君臣上下无不愤慨,唯司马迁别出心裁,为其辩说。按正常的理解,如果一人能无所顾忌地去护持另外一人,他应该是已完全了解对方,而司马迁之于李陵并不是这样;司马迁自己就曾坦言,他与李陵不仅“素非相善”,而且“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①,这足以说明:在司马迁决定为李陵开脱罪责前,他们之间甚至连一般性的接触都不曾有过。没有任何接触,自然就谈不到真正了解。所以司马迁对李陵的高扬和称美,如“事亲孝,与士信”及“有国士之风”云云,实际上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主观感觉。而主观感觉是最靠不住的,当李陵贪生而降已成事实后,司马迁本应有所醒悟,本应重新梳理一下自己的原有印象。因为“(士)不能轻死亡,不能恬贫穷,而曰我能行义”^②,自古以来就无人相信。但司马迁对自己的主观感觉是太过拘泥了,以至于在事实已明的情况下他仍推言李陵之降叛乃是为了“得其当而报汉”。毫无疑问,这样的推言既没有任何依据,也超出了人们可接受的限度。据此,则武帝视司马迁之言“诬罔”并非全无道理,而司马迁之获刑下狱也并非像某些当代论者所认为的那样纯属冤案。

其实早在东汉时期,王充既已对司马迁之袒护李陵提出过批评。王充认为,司马迁之“身任李陵”实有可非,其“坐下蚕室”,也有他自身方面的原因。从李陵降叛的性质来看,王充的这一批评无疑是较公允的。类似批评亦见于宋人张耒的《司马迁论》:

且方李陵之降,其为汉与否未可知,而迁独激昂不顾,出力辩之如此,几于愚乎?与夫时然后言,片言解纷者异矣。不知其失,而惑天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时人不援己于祸,而拳拳晏子,迁亦浅矣。^③

张耒指出,司马迁不顾一切地袒护李陵,既不明智,又令人费解;在遭到残身之刑后,他仍不自省却质疑天道,更显得有悖情理。在张耒看来,司马迁之所以最终受祸,乃是由于他本人的识见和行为存有过失。

相比于王充、张耒的上述看法,前引王夫之、顾炎武对司马迁及李陵的评判还更尖锐;在他们的评判中,不仅李陵降北属大逆不道,而且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亦为“背公死党之言”。他们指出,司马迁为李陵所做的辩说是绝不能被接受的,否则将肯定会开启一危险先例;有了这一先例,此后的为将者便很可能仿效于他,很可能也会将个人的苟且偷生标榜为权宜之计;长此以往则“国无守臣,人无植节”,整个王朝的立国之基就彻底被毁了。顾、王二人的这些见解,其实正反映了武帝当时的内心忧虑,据《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述,当闻知汉军覆败的消息,武帝除急于想弄清李陵是否已舍身死节外,别无任何过激之举,只是在最终的结果被确认后,他才勃然大怒并动了杀机。李陵全家遭难固然显得太过残酷和悲惨,但其祸难的发生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武帝的个人意志,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任何一朝君主在处置降将叛臣时都可能会像武帝那样按律行事。另外,当时朝臣们“皆罪陵”^④的明确态度,对于李氏家族悲剧的产生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朝臣们的一致表态也并非完全是为

①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9册,第2729页。

② 《韩诗外传》卷二第十五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6页。

③ 《张耒集》卷四一《司马迁论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64页。

④ 《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第8册,第2455页。

了迎合武帝。因为在尚气节、重操守且民族自信已彻底树立起来的武帝时代，朝臣们为李陵的降叛而感到羞辱与愤怒原本是很自然的。这样的感觉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高贵意识；武帝时代的汉家王朝之所以能常令他邦君臣心存敬畏，之所以能尽显其恢弘与壮丽，很大程度上即缘于此高贵意识在时人的精神世界已充分展开。这一方面会使得人们更加注重自己的荣誉，另一方面也会令他们将个人荣誉与国家的尊严更为紧密地关联起来。由于有了这种关联，李陵的降叛也就意味着对每一个体都构成了伤害。司马迁在决定为李陵辩护时显然完全忽略了这一关键点；当时他首先想到的只是武帝的个人心绪以及如何去“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①。但这类想法既不合于武帝的深思远虑，也背离了朝臣的集体意志。这样一来，当司马迁将自己的想法说出后，其伤身之祸就难以避免了。对此，如结合他下狱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②的孤苦境遇去看，还将更为明显。

在经历过那场灾祸后，司马迁便完全丧失了其原有的士大夫身份。作为通晓古今的史学大家，他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爱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忧慨之士乎。^③

官刑的残身性质令司马迁深感自己已辱没了先人，已无“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④；而历代“刑余之人”的倍受鄙夷又使他意识到将永远不复能与士君子比，这就是司马迁所承受的双重压力。在此重压之下，司马迁当时的精神状态实际上已濒临崩溃，所谓“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⑤，即是他对于那种状态的真实描绘。司马迁能够承受住如此巨大的压力而坚持活下来，充分反映了其人生信念的不可动摇与生命意志的顽强坚韧；只是在重辱加身的情况下，那样的坚持很可能引起人们的误解或怀疑；对于这一点，司马迁实际上是有预感的。正是因为有此预感，其本已受伤的心理才又生焦虑，并且从《报任安书》及《史记》中的诸多议论来看，这种焦虑当伴随他走完了余下的生命路程。

司马迁因个人的未竟之业而选择了生存，同时又在为自己的忍辱负重而感到焦虑，说明他内心存有矛盾。其内心矛盾的产生，一方面是缘于他敏于自省的高尚心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受到了传统与当下士风的间接触动。纵观秦汉前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自从士阶层于春秋时期形成后，在频繁的世事变故中即不断地涌现出了一些“死节”人物，并且根据先秦时期的文献资料，这些人物的“死节”，既完全是出于自愿，又经过了认真的考虑，因此他们的最终结局往往会给人以这样的启示，即某种理念或道德原则明显地要高于生存本身，对其价值应用全部生命去加以捍卫。随着这类启示的不断出现和深入人心，自孔子开始的那种理念或道德原则便得到了明确规定，《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在孔子的这一规定中，由于“仁”已被高扬至生命之上，它自然就成了超越一切的最高理念；由此，理想人格的问题亦彻底显现出来。对于将要登上历史舞台的战国士人而言，这无疑会有助于他们相关思虑的进一步展开。于是当战国时代来临后不久，墨子便提出了“万事莫贵于义”^⑥的重要命题，同时为使这一命题得到充分证明，墨子还就“义”与“身”及“天下”的关系做了十分新颖的推演和分析。墨子之后，孟子的“舍生”之说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

①②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9册，第2730页。

③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9册，第2727页。

④⑤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9册，第2736页。

⑥ 《墨子·贵义》，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46页。

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①

在此，孟子急于想阐明的观点是：当“义”与“生”形成尖锐对立而必须有所取舍时，敢于主动地放弃后者将更能彰显出人之为人的真正意义。类似观点在《荀子·正名》中亦有较清晰的表述。见于儒、墨各家学说中的上述观点和命题，也是为战国士人所熟悉的，很多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可以用行动去证明自己已完全接受了那些观点或命题。在战国时期，有人能决然而平静地去面对死亡，已不是个别现象。另外，还需指出的是，令这种现象蔓延开来的战国之士大都为相对自由的独立个体；他们或没有固定的服务对象，或者有但彼此间仅是保持着很松散的关系。他们可以在某一执政者门下供职，也可以因心绪不畅拂袖而去；当最后之日迫近时，他们也大都是依凭于个人的意志来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这一切说明，频见于战国时期的“舍生”现象乃是以士人们的自由选择为前提的。由于有了这个前提，他们的慷慨赴死就使得“义”或某种理念显出了绝对价值。所以从本质上讲，战国士人悲壮“舍生”与其春秋前辈的主动“死节”是一脉相承的，这类一脉相承的行动连同与之完全对应的“仁”、“义”观念即构成了先秦士风的一大特点。

以勇于挑战死亡为具体形态的先秦士风的上述特点，基本上被西汉士大夫用新的表现方式继承了下来。与先秦士人相类似，西汉士大夫们的内心同样是不甘寂寞和崇尚进取的，他们不仅激情满怀地追求功名，而且更担心自己会陷于平庸，司马迁所谓“没世无闻，古人惟耻”^②即比较真实地道出了他们普遍怀有的进取心理。受这种心理的驱动，西汉士大夫们大都热衷于现实政治，大都乐于在服务国家或个人冒险的行动中去实现自己；西汉一朝，隐逸之风能长时间地处于消歇状态，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此。当然，现实政治是易生变故的，过度地投身其中难免会招来致命的纷争与冲突，这在风云际会的西汉时期乃常有之事；而每当这类纷争、冲突发生时，身陷其中的士大夫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将最终获罪，首先考虑的往往是个人的尊严，继而在必须采取行动的关键时刻到来时，他们宁可选择自尽也坚决不肯下狱。这方面的具体事例，于《史记》、《汉书》中是举不胜举的。西汉士大夫每每能在关键时刻如此行事，说明在他们心目中捍卫尊严甚至比保全生命更重要。在他们看来，囚于囹圄、面对狱吏已伤害到人的尊严。对于这类伤害，理所当然地应以死去进行抗争。“困辱不能死，耻也”^③，乃是西汉士大夫们全力坚守的处世原则。在这一原则之中，不仅寓有他们鲜明的个性风范，而且还渗透着其强烈的人格意识。

当司马迁遭受酷刑时，其身后的士风背景大体上就是这样。可以想见，由这种士风背景引起的深深焦虑，再加上愧对先人和身份丧失的双重压力，必定给司马迁的精神、心理造成了巨大磨难。然而凭着超凡的意志和信念，他最终还是坚持活了下来。从这一角度看，司马迁之选择生存，甚至比接受死亡还要艰难。

三

对于自己受刑不死的原因，司马迁是从两方面来解释的：其一，“假令仆伏法，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④。其二，“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彩

① 《孟子》卷一一《告子上》，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5页。

② 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艺文类聚》卷三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41页。

③ 《盐铁论》卷一〇《大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0页。

④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9册，第2732页。

不表于后世也”^①。通过前一方面的解释，司马迁意在强调：如果能死得其所，他本人早已具备了舍生的勇气与魄力。通过后一方面的解释，司马迁是想说明：自己所以能忍辱负重而不辞世，目的全在于要完成《史记》的著述工作，一旦完成了这项工作，其不朽的成就便足以“偿前辱之责”^②。与这些解释相表里，司马迁还进一步指出：不可以将放弃生存的行为看作是人的勇气或魄力的具体体现，因为“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③。当被逼无奈时，甚至连“臧获婢妾，犹能引决”^④。所以对于真正的贤人君子来说，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敢不敢舍弃生命，而是何时何地才可以采取那样的行动，所谓“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⑤便是司马迁就此问题给出的明确结论。这一结论即构成了司马迁之生死观的基本轮廓，而轮廓中所含的主要内容则是“贤者诚重其死”^⑥和“勇者不必死节”^⑦。

不过在崇尚英雄与注重气节的汉武帝时代，要人们完全理解和接受这种性质的生死观也并非没有困难。因为依照传统观念，勇者死节、贤者重义乃理所当然之事；倘若两者都反其道而行之，其人格特征也就彻底丧失了。对此，司马迁同样十分清楚，所以为缓解其生死观的新异强度，他又将价值要素引入其中：“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⑧通过价值要素的引入，司马迁又使生死问题与人生追求形成了紧密关系，而且在考虑两者的关系时，司马迁始终把后者置于首要位置并视忍耐力为其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司马迁强调，忍耐力是古代圣贤大都具备的可贵素质，正是由于具备了这种素质，才使得他们有勇气去面对困辱并表现得坚韧不拔、自强不息：

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⑨

司马迁认为，西伯、孔子等古代圣贤完全是凭着超凡的忍耐力才得以从困辱之境中抽身而出，并最终成就了其不朽功业且名垂青史，因此对于志存高远者来说，忍耐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即决定了他们是否能达到其人生目的。

司马迁的上述见解既部分地折射出了其艰难而痛苦的特殊经历，又在《史记》中的一些人物身上留下了印迹。例如在《史记》中，韩信成年后所受的胯下之辱即颇显古怪奇异，因为按正常理解，这种非同寻常的耻辱性遭遇不可能发生于一代名将身上。而司马迁认定韩信有此遭遇并用欣赏的笔调来加以描述，其真正意图不外乎是想说明忍耐力之于人的自我实现有重大意义。同样意图亦见于司马迁对季布所做的心理分析：

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⑩

十分明显，司马迁的这种分析已带有较重的想象成分，借助于自己的想象力，司马迁实际上已将贪生怕死的因素从季布之所以隐忍苟活的原因中彻底地排除了出去，进而使原本复杂的人物形象变得单纯了。但为司马迁如此推许的季布乃一十足的世故之人，为求自保，此人不仅失节背主、鼠窜蛇伏，而且自愿领刑、甘作下奴。对于他的这类行迹，甚至连生性怯懦、常守寂寞的扬雄都不以为然：

或曰：“季布忍焉，可为也？”曰：“能者为之，明哲不为也。”或曰：“当布之急，虽明哲之如何？”曰：“明哲不终项仕，如终项仕，焉攸避？”^⑪

扬雄不满于季布的苟且偷生说明他是侧重于从人格品性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司马迁对同一人物持肯

①③④⑦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9册，第2733页。

②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9册，第2735页。

⑤ 《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8册，第2451页。

⑥⑩ 《史记》卷一〇〇《季布栾布列传》，第8册，第2735页。

⑧⑨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9册，第2732页。

⑪ 《法言》卷一〇《重黎》，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8页。

定态度则表明他所选取的评价标准侧重于人的价值。不过因司马迁在做此评价时还背负着特殊的心理负担,甚至还要为自己的忍辱不死寻找依据。在他的结论中,原属本能性的求生行为便往往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有关这方面的其他实例:

(彭越)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乃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

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过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①

可以看出,司马迁在此同样是凭着想象来评述人物,即使仅就司马迁亲笔完成的人物传记而言,这一评述也令人难以完全信服。因为据《史记》本传,彭越之所以“幽囚而不辞”,主要原因即在于他对死亡怀有极度的恐惧心理。受恐惧心理的钳制,他先是在应对突发变故时表现得张皇不定、进退失据,后又幻想着能以卑躬屈膝、逆来顺受的姿态去拯救自己;而且为了达到求生目的,他甚至可以做得像奴仆一样啼哭着向主人乞求宽恕。这一切表明:当被收下狱及求得赦免后,极度的恐惧心理已使得彭越再无力自持于个人的人格尊严。司马迁谓“中材以上且羞其行”,说明他也意识到了彭越的求生之举太过卑下。但尽管如此,司马迁还是认为这些举动正体现了彭越其人的志向远大和抱负不凡。

能够意识到某类行为的基本性质却又不给出与之相符的应有结论,也是司马迁在评价某些历史人物时采取的独特方式,其中既融有他刑后余生的抑郁苦恼,也隐含着 he 渴望自拔的深层用意。本文前面已经指出,在经历过李陵之祸后,司马迁除了要承受巨大的身心伤痛外,还需面对自我价值如何实现与世人误解怎样消除这两大难题。对于前一难题,司马迁主要是通过《史记》的著述来解决的,并且当著述工作完成后,他本人也觉得已达到了目的。但对于后一难题,却没有真正可行的解决办法,因为这一难题乃是由具体的行动引起的,若想要它彻底消失,真正有效的办法只能是采取完全相反的另一行动,而在当时已全无可能。这样则留下的难题便只有以反复言说的方式来应对处理。当然,在应对处理的过程中,司马迁也并非只是一味地空发议论,而是常常会借助重新诠释前人的某类行迹来表达观点。因为他深知,将个人的观点载之空言,远不如使其“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②。不过由于司马迁对前人行迹的某些诠释并不是出于单纯的理论兴趣,并不是以审慎客观的冷静思考作为前提,他所提出的观点便往往将原属本能反应的行为举动予以过分高扬,进而使一些手段与过程都不算高尚的目的追求成为了人生的第一要义。这种现象除见于前面已分析过的实例外,还可以从司马迁对伍子胥的极力推许中得到进一步印证:

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

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③

《史记》所传的伍子胥本属一心性极复杂之人,此人的后半生几乎都在为实施其复仇计划而奔命游走。当领兵入郢并出平王尸而鞭之三百后,伍子胥就自己的复仇之举曾作出过解释:“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④ 相比于司马迁的极力推许,伍子胥本人的这种解释显然更为客观,更适合用作其行为的准确定性。因为伍子胥乃楚人,其父祖亦世食楚禄,在楚平王死后,他仍引兵入郢并掘墓鞭尸,这即使不尽如申包胥所斥责的那样属“无天道之极”^⑤,至少也反映了其心理的灰暗与性格的扭曲。而这种扭曲的性格及灰暗的心理却被司马迁认定成了“烈丈夫”的重要标志;在他看来,伍子胥那近乎疯

① 《史记》卷九〇《魏豹彭越列传》,第8册,第2595页。

②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10册,第3297页。

③ 《史记》卷六六《伍子胥列传》,第7册,第2183页。

④ 《史记》卷六六《伍子胥列传》,第7册,第2177页。

⑤ 《史记》卷六六《伍子胥列传》,第7册,第2176页。

狂的一意孤行非但无需受到指责，而且还应得到赞誉。司马迁以如此奇特的视角来看待伍子胥的复仇之举，再次表明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是依循着这样的一种思路，即只要能达到个人目的并实现自己的价值，手段的如何选择并不是问题。透过这种思路，司马迁因遭遇横祸而导致的认知局限也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司马迁的认知局限不仅在其笔下的一些隐忍者身上时有显露，甚至个别时候还妨碍了他对真正的悲剧性人物的全面理解。这一点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即反映得较为明显。综观《史记》所录的各类人物，堪称完美且最具悲剧色彩者当首推屈原。屈原的形象因通体浸透着坚毅、静穆与忠贞不渝的高贵气蕴，自汉代起就一直感动着世人。同样，对于极具人格魅力的屈原，司马迁也是一往情深的：“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①在整部《史记》中，能令司马迁这样为之伤怀和动情的人，除屈原外似难以再找出第二例。但即使如此，司马迁仍然对屈原的投江自尽提出了异议：“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②司马迁认为，屈原的最终选择非常令人遗憾；凭借个人的出众才华，他完全可以离开楚国去游历诸侯，而且只要去游历诸侯，其自身价值很可能会得到彻底实现。诚如司马迁所识，战国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的确为屈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屈原也确实可以于他邦异乡生存下来且不失体面。但假如是这样的话，则屈原就不复是悲剧性的屈原了。其实这对于司马迁来说同样是不言自明的，在其内心深处，屈原的投江而死与他的人格魅力也应该是相融合的。否则，司马迁便无须临渊生悲、伤情落泪了。

既倾情于屈原的人格魅力，又不尽认同于他的投江而死，反映了司马迁在作此人物评价时乃是立足于不同的角度。即使是对于真正悲剧英雄的处理，司马迁的判断和思虑也还是会受到其独特的价值观念的左右。由此可再次得出结论：痛苦的陷刑之辱与强烈的自拔渴望确实影响了司马迁对人生价值的全面思考，确实令他有些时候因太过注重“隐忍就功名”之类的目的追求而低估了另一种选择的深刻意义。

关于司马迁的人生悲剧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我们从以上三个层面作了适度的评述和分析。我们作此评述、分析的目的，就是想尽量真实地将司马迁的心志性情特点全面展示出来。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同时注意到了《史记》的人物画廊还陈列着一定数量的慷慨悲歌之士，并且对于他们的轻生重义和最终结局，司马迁也是充满同情与心存敬意的。这种情况与本文已阐明的观点并不矛盾，因为作为一位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大家，司马迁的精神境界原本就是非常开阔的，其思想形态也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史记》中有那些慷慨悲歌之士的存在，正体现了其精神境界与思想形态的高远和丰满；惨痛的祸难后，司马迁仍怀有强烈的悲剧意识与历史责任感。司马迁的伟大与不朽亦在于此。

〔作者简介〕董志广，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发表过论文《齐梁人的心态与咏物诗》等。

（责任编辑 孙少华）

①② 《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第8册，第2503页。